
科教能否增进“一带一路”国家 城市经济联系？ ——基于浙江及其国际友城数据的实证分析

钱晨¹

【摘要】: 本文针对“一带一路”国家城市特点, 探索发展中国家城市网络理论; 运用浙江与“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友城数据, 构建优化模型并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科教与经济之间的机制关系。结果表明, 科教能显著增进“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友城间的经济联系。建议在具有较强经济联系和扩散能力的城市间加深科教联系, 从而更好地开展城市经济合作,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关键词】: “一带一路” 科教 经济 世界城市 国际友城

一、引言

科教是文化输出的重要载体, 跨国间文化认同是增进经济联系的重要手段, 城市经济联系是“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共赢的发展基础。与我国在留学教育、国际科研合作方面排名前三的美国、英国与日本, 同时也是我国前三大贸易伙伴国。相比较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要相对弱一些, 在国际经贸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 对新兴市场国家市场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亟需对发展中国家的科教与经济联系逻辑进行梳理与分析。

因发展中国家数量众多、特色各异, 本文瞄准一类具有共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自2013年以来, “一带一路”倡议开拓了资本、产业、商品、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全球化流动的新通道, 正在为沿线国家提供新的合作发展方式和政策红利。2018年5月召开的浙江省对外开放大会上, 车俊书记提到要加强国际友城建设, 优化国际友城发展总体布局, 实施典范友城创建工程, 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朋友圈”, 推动地方政府间开展务实交流合作。国际友城是一类特殊跨国联系载体, 具有天然的政治互通、文化认同、科教往来与经济联系等方面的优势。为此, 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在“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友城国家。

二、联系机制

(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特点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引发了学界对沿线国家城市的关注, 部分相对发达的枢纽性城市, 对沿线国家城市起到标杆和带动作用, 对经济水平和城市能级提升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特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¹ 本文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9NDJC272YB)、浙江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重点资助项目(2019GBL01)的成果。

第一, 沿线基本上为发展中国家, 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这些城市是参照发达国家城市经验发展起来的, 对城市问题的思考较为成熟。第二, 沿线国家城市是历史上各国经济贸易大通道, 具有天然的城市网络属性。经贸往来为文化互通、消费习惯传递提供了物质载体, 例如王姣娥、吴乐和霍丽等学者运用城市流强度模型、城市功能测定模型等分析工具, 对沿线重要城市网络的要素流量、要素集聚进行了分析。^①第三, 沿线国家城市要素条件差异度较大, 为城市产能供需匹配与合作提供了空间。^②

(二)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经济联系

目前世界城市网络理论是研究和评价城市经济联系的主流理论, 该理论可以追溯到美国经济学家Friedmann提出的“世界城市假说”, 他认为跨国公司是参与世界城市网络联系的重要主体, 加速了全球城市网络理论的发展。^③在此基础上, 美国学者Sassen于1991年对伦敦、东京、纽约这三个典型国际化城市进行研究, 提出了先进生产性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 Service, 简称APS)是跨国公司国际化的关键业务。^④从此, APS成为了城市经济联系的重要标杆。进一步地, 英国拉夫堡大学于1998年成立了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tudy Group and Network, 简称GaWC), 创始人Taylor提出使用APS的全球分布来衡量城市经济联系水平, 并对全球315个城市进行了排序。^⑤GaWC的联锁网络模型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成为了主流分析框架, 国内学者对一线城市进行了系统研究, 有效促进了国内一线城市国际化途径的反思。^⑥

不难发现, APS的数量与分布, 对城市经济联系至关重要, 但是APS的全球布点与城市工业化历史和发展阶段关系紧密, 适用于世界城市网络中高级别的全球城市研究, 即世界一线城市设定了城市经济联系排序标准。由于城市工业发展特殊历史等原因, 发展中国家城市在国际话语权上存在发展瓶颈。现实是国内大量城市在本世纪将寻求国际化发展路径, 同时受到城市经济联系衡量标准的话语权限制, 对这些后发城市而言显然有失公允。与发达国家城市不同, 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出现了多元国际化趋势。例如著名旅游度假胜地马尔代夫具备世界城市航港流标准、著名高校与研发机构所在城市具备世界城市人才流标准等, 但这些城市在GaWC联锁网络模型计算的世界城市排名一直处于较为靠后的位置, 不利于获取国际认可。不可忽视的是, 上述城市正在通过某种单一优势要素流, 与世界城市网络缔结了联系, 这为没有经历完整工业革命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城市, 提供了一种新的与其他城市缔结经济联系的路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友好城市虽然存在地理上的跨域, 但作为一类特殊关系缔结城市, 在发展阶段、文化认同和经济利益等方面有较高的相似性。目前城市网络研究大多聚焦在相邻区域范围内的城市, 国际友城作为一类具有特殊关系且跨域缔结的城市, 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城市理论的空间认知。随着互联网、现代航运等技术发展, 大大促进了跨域城市间的各类要素流动, 要素流空间理论为城市联系提供了理论支撑。因此, 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友好城市的APS分布总体较少, 但由单要素流链接的城市, 也具有较高嵌入世界城市网络的能力。“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为这些城市凝聚提供了特殊机遇, 或许可以为更多发展中国家城市获取国际资源提供启发。因此, 本文试图将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联系特点纳入世界城市网络的分析框架中, 拓展理论的解释范围。

^①王姣娥等:《“一带一路”与中国对外航空运输联系》,《地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5期。吴乐、霍丽:《丝绸之路经济带节点城市的空间联系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②苏宁、杨传开:《“丝路城市”:“一带一路”沿线城市节点的特征与发展意义》,《世界经济研究》2017年第8期。

^③Friedmann J.,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17, No. 1, 1986, pp. 68-83.

^④Sassen S.,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⑤Taylor P. J., Specification of the World City Network, Geographical Analysis, No. 33, 2001, pp. 181-194. Taylor P. J., World City Network: A Global Urban Analys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⑥倪鹏飞等:《中国城市联系度:基于联锁网络模型的测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6期。马学广、李贵才:《全球流动空间中的当代世界城市网络理论研究》,《经济地理》2011年第10期。姚永玲等:《北京和首尔全球城市网络能级及其动力因素比较》,《经济地理》2012年第8期。刘江会、贾高清:《上海离全球城市有多远?——基于城市网络联系能级的比较分析》,《城市发展研究》2014年第11期。

(三)科教对发展中国家城市经济联系的作用

城市联系强度是跨域城市网络缔结的基础,经济联系与人口流动是关键影响因素。城市网络空间中存在着诸如经济联系、自然联系、人口流动网络、社会相互作用联系、服务传输联系、政治、行政和组织联系等六种联系类型,^①其中对影响跨域城市网络缔结程度最大的因素是经济联系与人口流动,^②这两个因素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一带一路”国际友城是一类具有一定政治与人文保障的跨区域城市,是研究经济联系与人口流动的天然样本。

国内城市间的人口流动研究,多从经济、文化旅游交流、港口吞吐量等某个要素流动的“软网络”视角来分析,从而拓展城市网络理论;^③发展中国家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则聚焦于文化认同对经济社会效应的促进关系,^④部分学者在对城市竞争力分析时发现经济水平与城市竞争力的相关性存在减弱趋势,而文化认同和个体发展自由度是吸引人才的强指标。

进一步地,学界普遍提出科技与教育产业输入与输出是本国文化获得国际认同的有效载体。^⑤“一带一路”幅员广阔,国际关系复杂,民族宗教各异,历史文化存在很多差异,文化先行有利于求同存异和讲好中国故事。科教深入合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更好地认识中国城市提供了平台。

三、模型设计

(一)研究对象

首先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中华文化走出去重点工作任务清单》文件中涉及的国别分类,“一带一路”沿线共有60多个国家,文件选取了25个国家作为重点国家(见表1)。其次根据“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官网查询信息,浙江省国际友城结对数是101对,全国排名第5位,从中筛选出从属重点国家的城市与国家信息(见表2)。综合考虑国际友城示范效应、数据可得性和规模相当等因素,我们将重点友城国家及其重点邻国作为研究对象(见表3)。

表1 “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

选择依据	国家名单(25个)
区域辐射影响力强、战略支点作用明显(其中俄罗斯等“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大国不包含在内)	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蒙古、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越南、柬埔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伊朗、土耳其、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

数据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

^①覃成林等:《区域经济空间组织原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②朱英明:《城市群经济空间分析》,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③Jacobs W., Ducruet C., Langen P. D., Integrating world cities into production networks:The case of port cities, Global Networks, Vol. 10, No. 1, 2010, pp. 92-113. 马海涛:《基于人才流动的城市网络关系构建》,《地理研究》2017年第1期。
^④施雪琴:《认同规范与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琼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赞尼尼等:《“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打造文化认同的一项宏伟社会工程》,《欧洲研究》2015年第6期。
^⑤邢媛:《论两种不同经济模式下的文化认同》,《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3期。汤凯、许锦锦:《“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竞争力测评与优化》,《经济问题探索》2016年第5期。

表 2 研究对象来源国家列表

友好城市	“一带一路”重点国家	结好时间	编号	浙江对口城市	友好城市所属国家的邻国 (*表示“一带一路”重点国家)
明斯克州	白俄罗斯	2015/05/10	2219—15051 2—浙—099	浙江省 (省级)	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
碧瑶市	菲律宾	1982/08/13	0075—82081 3—浙—005	杭州市	马来西亚*
布达佩斯市	匈牙利	1999/08/03	0905—99080 3—浙—041	杭州市	奥地利、斯洛伐克、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
比得哥什市	波兰	2005/10/11	1287—05060 3—浙—066	宁波市	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俄罗斯、德国、捷克*、斯洛伐克

数据来源: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http://www.cifca.org.cn>)。

表 3 研究对象国的区域分类

区域	国际友城所属国家	邻国且“一带一路”重点国家
I	白俄罗斯(中上等收入国家)、 波兰(高收入国家, 经合组织成员国)	乌克兰(中低等收入国家)、 捷克(高收入国家, 经合组织成员国)
II	匈牙利(中上等收入国家)	乌克兰(中低等收入国家)、罗马尼亚(中上等收入国家)、 塞尔维亚(中上等收入国家)
III	菲律宾(中低等收入国家)	马来西亚(中上等收入国家)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经作者整理。

(二) 研究模型

1. 经济联系强度

经济联系强度是能够度量空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指标, 指标计算方式由空间引力模型演化而来, 它反映了中心区域对周边一定区域范围内其他区域的经济辐射能力, 是一种体现区域间联系的常用量化方法。通过计算经济联系强度指标, 能够反映浙江省与研究对象国之间的经济关联程度。

本文借鉴了薛丽萍对经济联系强度和城市流强度的计算模型,^④并在此基础上, 将模型变量解释范围从城市扩展到了区域, 基本步骤与计量模型如下描述:

^④薛丽萍等:《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经济联系的空间作用分析》,《经济地理》2014年第11期。

$$R_{ij} = \frac{\sqrt{P_i V_i \cdot P_j V_j}}{D^2} \text{ (式 1)}$$

第一步, 计算经济作用强度:

$$R_i = \sum_{j=1}^n R_{ij} \text{ (式 2)}$$

第二步, 计算经济作用总强度:

$$I_i = \frac{R_{ij}}{R_i} \text{ (式 3)}$$

第三步, 计算经济隶属度:

其中, R_{ij} 是 i 区域和 j 区域之间的经济作用强度, R_i 是 i 区域与其他区域之间的经济总强度, I_i 是区域经济隶属度 (反映经济作用强度比例)。 P_i 和 P_j 分别代表 i 区域和 j 区域的总人口数, V_i 和 V_j 分别代表 i 区域和 j 区域的生产总值, D 代表 i 区域和 j 区域之间的距离。

2. 区域流强度

区域流强度是子区域通过某种流关系对外产生的辐射与聚散效应, 反映子区域对外联系强度。通过计算区域流强度指标, 能够反映研究对象国在一定区域内有哪些扩散特征。基本步骤与计量模型如下表述:

$$LQ_{ij} = \frac{Q_{ij}/Q_i}{Q_j/Q} (i=1, 2, \dots, n; j=1, 2, \dots, m) \text{ (式 4)}$$

第一步, 计算区位熵:

其中, 区位熵 LQ_{ij} 也被称为专门化率, 揭示 i 子区域 j 部门的外向功能性。研发投入是一个国家科技与教育发展的坚实保障和有效推动动力^{①②}, 为此模型中变量 j 同时考虑教育与科技两个部门。 Q_{ij} 是 i 区域中 j 部门从业人员数量, Q_i 是 i 子区域从业人员总数, Q_j 是全区域 j 部门从业人员数, Q 是全区域从业人员总数。如果 $LQ_{ij} > 1$, 表示 i 子区域因 j 部门而具有外向功能, 数值越大表示外向程度越高; 反之, 如果 $LQ_{ij} < 1$, 则表示 i 子区域 j 部门不具有外向功能。

$$E_{ij} = Q_{ij} - Q_i \cdot (Q_j/Q) \text{ (式 5)}$$

第二步, 计算外向功能量:

$$E_i = \sum_{j=1}^m E_{ij} \text{ (式 6)}$$

第三步, 计算全区域总外向功能量:

E_{ij} 表示 i 子区域 j 部门的外向功能量, E_i 是 i 子区域的总外向功能量。

$$N_i = GDP_i / Q_i \text{ (式 7)}$$

第四步, 计算功能效率:

$$F_i = N_i \cdot E_i \text{ (式 8)}$$

第五步, 计算区域功能流强度:

N_i 表示 i 区域就业人员人均 GDP, F_i 表示 i 区域的流强度。

^①彭斌:《创新型科技企业杠杆率的研发强度效应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年第4期。

^②肖广岭:《从研发资源看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9期。

(三)数据来源

以上模型中的人口数、劳动力人口数、生产总值的指标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中国国家统计局;教育部门从业人数的指标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科技部门从业人数用R&D研究人员人数代替,指标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受限于国际数据同年可得性,以上指标的数据均选自2017年,其中存在少量指标数值缺省一年的情况,采用指数平滑法填补。

区域间距离在原理上由空间上两点间距离来计算,随着现代交通的普及,不少文献采用航班(或高铁)的航行(或行驶)距离来计算。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区域外向性程度一般与国际航班直航率成正向关联,因此使用通勤时间来度量空间距离,显得更为直观且贴近现实。为此,本文采用两点间最短航班时间来表示区域间距离,指标数据来自于浙江省三大典型国际机场(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网站信息。

四、实证分析

基于经济联系强度和区域流强度模型,分别以人口数、GDP、航班最短时间、科技部门和教育部门从业人数等为指标变量,对3个区域中9个国家的科教流的作用强度、方向进行定量测度与分析评价。

(一)经济联系强度

根据公式(1)得出9个友城国家与浙江省之间的经济作用强度(见表4)。区域间经济作用强度处于第一梯队的是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两国的数值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主要原因源于其地理距离优势。处于第二梯队的是波兰和捷克,其数值在20-30之间。处于第三梯队的是罗马尼亚,其数值在10-20之间。处于第四梯队的是白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其数值在0-10之间。

根据公式(2)和(3)得出9个友城国家在各自区域中的经济隶属度,结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除地理距离优势的影响。我们在三个区域内进行分别比较,并关注排名前50%的国家。分析结果发现区域 I 中的波兰和捷克、区域 II 中的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区域 III 中的菲律宾都属于经济隶属度较高的国家,其中国际友城所属国家占据了60%。

表 4 经济联系强度计算结果

	区域 I				区域 II				区域 III	
	白俄罗斯▲	波兰▲	乌克兰	捷克	匈牙利▲	乌克兰	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	菲律宾▲	马来西亚
经济作用强度	7.07	27.43	4.29	26.67	6.97	4.29	13.70	0.82	801.09	231.17
区域经济隶属度	0.11	0.42	0.07	0.41	0.27	0.17	0.53	0.03	0.78	0.22

注:标记“▲”表示国际友城所属国家。

从表4中不难发现国际友城国家在经济联系强度指标上优于其他研究对象国家,印证了前文的文献推理。进一步地,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更好地促进和发挥这种联系,利用国际友城对其周边城市也产生影响?下文试图从科技与教育两个维度进行深一步的分析解释。

(二) 区域流强度

根据公式(4)得出三个区域在教育与科技部门的外向功能性的定性结果(见表5)。区域 I 中具有外向功能性的是乌克兰的教育部门,以及波兰和捷克的科技部门。区域 II 中具有外向功能性的是匈牙利、乌克兰和塞尔维亚的教育部门,以及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科技部门。区域 III 中具有外向功能性的是马来西亚的教育部门和科技部门。

根据公式(5)(6)(7)(8)得出在教育与科技部门的区域功能流强度定量结果(见表5)。区域 I 中乌克兰的教育流强度和科技流强度的结果均较为明显高于区域内平均值,同时捷克的教育流强度、白俄罗斯与波兰的科技流强度也不可小觑。区域 II 中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教育流强度、匈牙利和乌克兰的科技流强度都排名在区域内前50%。区域 III 中马来西亚的教育流强度与科技流强度均明显高于菲律宾。

表 5 区域流强度计算结果

部门分类	指标变量	区域 I				区域 II				区域 III	
		白俄罗斯▲	波兰▲△	乌克兰	捷克△	匈牙利▲△	乌克兰	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教育部门	区位熵	0.13	0.16	2.08☆	0.10	1.17☆	1.02☆	0.79	1.20☆	0.84	1.50☆
	区域功能流强度	40	42.4	120.33★	192.33★	8.74★	3.2	5.26★	0.94	6.68	20.12★
科技部门	区位熵	0.79	1.48☆	0.62	1.87☆	2.16☆	0.90	0.44	1.55☆	0.62	1.57☆
	区域功能流强度	32★	30.2	84★	23.9	16.62★	16★	7.4	1.29	4.62	8.26★

注:标记“▲”表示国际友城所属国家;标记“△”表示与浙江省经济隶属度区域排名前50%的国家;标记“★”表示区域内功能流强度排名前50%的国家;标记“☆”表示部门具有外向功能性。

(三) 综合分析

基于前文数据结果,我们不难发现区域 I、II、III的发展特色和要素禀赋不尽相同,浙江城市国际化亟需厘清表5中四种上标国家与浙江之间的关系。

本文认为浙江省城市要积极对接区域内功能流强度排名前50%且具有外向功能性部门的关键国家,例如区域 I 中的乌克兰、区域 II 中的匈牙利、区域 III 中的马来西亚;同时浙江省也要积极发挥经济隶属度较高的国际友城,例如区域 I 中的波兰、区域 II 中的匈牙利、区域 III 中的菲律宾。这些国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与浙江省有较强的经济联系,二是这些国家与周边国家之间具有某种要素(科技或教育)的较强扩散能力,有利于浙江依托这些国家,拓展和加深与其周边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

不难发现,区域 II 中的匈牙利在结果中出现了两次,城市网络凝聚能力较为显著,不禁进一步引发我们的思考,是什么可能的动因促成了这样的结果?于是本文反向梳理了 9 个研究对象国的中国国际友城分布情况,如图 3 所示,试图寻求可能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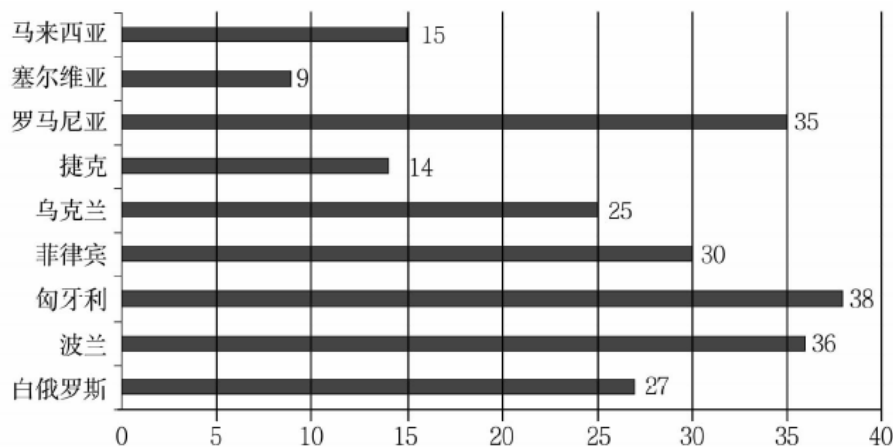


图 3 研究对象国的中国友城数量

数据来源: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 (<http://www.cifca.org.cn>)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白俄罗斯、波兰、匈牙利、菲律宾和罗马尼亚的中国国际友城数量均高于区域平均值水平。换言之,在各自区域中,这些国家相对其他国家而言有更高的中国文化认同感。其中,中国国际友城数量最高的就是匈牙利,其中与浙江省杭州市和宁波市结好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市,也与我国北京市、上海市、三明市和临沂市等多地同时结好。可见,国际友城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城市联系带来较强的经济预期,同时获得更为稳定的科教联系与经济联系。

五、结论与建议

浙江城市国际化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经之路,城市经济联系程度评价机制不应被世界发达国家城市标准限制,“一带一路”倡议为本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科教合作为沿线发展中国家城市提升城市经济联系程度提供了新思路。

“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与浙江省许多城市相仿,国际友城在文化认同、民间往来、经济互通等方面具有的天然优势,借助国际友城这一现实载体,我们可以发挥好重点国家国际友城对周边国家的扩散效应,缔结浙江省与“一带一路”沿线更大范围内的城市网络,参与世界城市网络的竞争与合作,获取更多国际资源。本文得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浙江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可以首先考虑具有较高经济隶属度且具备国际友城的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和菲律宾。其次,罗马尼亚和捷克对其周边区域有较强的经济影响,我们值得通过建立更多国际友城等方式,加深与两者之间的城市关系。再次,中欧班列对城市网络缔结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文虽然没有对班列进行针对性分析,但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已感受到了数据结果受到班列途径城市的影响,因此这些班列途径城市也是浙江寻求国际产能合作的可选城市,这也将是本研究未来值得深入挖掘的新问题。

第二,科教是文化输出的重要渠道,文化认同是经济合作的关键基础,科技教育与经济一直是浙江的关注点,两者之间可以互相借力、打好“组合拳”。文章认为浙江在打造“教育强省”的过程中,可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友城国家进行高校人才交流、国际学府引入、企业科技互通等方面的科教深度合作,值得考虑欧洲的乌克兰、捷克、白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在科技与教育方面的发展程度较高且具有较强外向性。

第三,国际友城是文化传递与认同的良好载体,但是现实中我们仍不够重视友城对科教和经济等城市联系缔结的贡献。世界城市网络的嵌入方式,关系到城市进行国际资源交换与合作的地位和作用,发展中国家城市国际化必须依托国际其他城市的力量

。发挥好国际友城的战略地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一是加强与国际友城之间的科教联系,例如通过新办孔子学院的方式进行本土文化外译,通过国际教育办学方式进行中华价值观输出等;二是为文化互通提供更多经济载体,建立文化与经济互促的良好机制,例如为国际友城提供更多国际展会机会,通过浙江商品和服务的海外宣传,获得更为直接的文化认同感。

(作者钱晨,浙江外国语学院国际经济与旅游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杭州 310023)